

翁扬 / 主编

伟大人民领袖毛泽东丛书

毛泽东^① 中国当代杰出革命家

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

毛泽东与中国当代杰出革命家

翁 扬 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北京·2004

《伟大人民领袖毛泽东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邓力群 袁宝华 李尔重

袁 木 林默涵 贺敬之

魏 巍 朱子奇 郑怀义

编 审 徐非光 马莹伯 郑伯农

编辑委员会主任 余 飘

编辑委员会委员

陈志昂 刘贻清 何火任

杨桂欣 梁惠民 翁 扬

总 序

毛泽东在当代人心中占有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他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巨人之一，是中国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也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毛泽东不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而且是伟大的军事家、外交家，又是杰出的诗人、书法家和大学问家。他为我们的党和军队的创立和发展，为全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光照日月的贡献。

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00 多年，前仆后继，艰苦卓绝，可歌可泣，却屡遭失败；只有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洗雪了多年来民族的奇耻大辱，实现了中华民族独立自强的梦想，使中国人民挺直了腰杆，真正地站起来了。正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消灭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剥削制度，结束了过去苦难深重的时代，进入了人民自己当家做主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崭新时代。老百姓从切身体验中提炼出这样的警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

星”；“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不忘毛主席”；“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些语言不仅是客观真理的概括，也集中强烈地表达出中国人民对毛主席的由衷感激和崇敬之情。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又说：“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我们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向前发展。”胡锦涛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出了我国人民因为有了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领袖而感到巨大的幸福和无比自豪的共同心声。

我们编辑《伟大人民领袖毛泽东丛书》的目的，就是表达广大人民怀念和崇敬毛泽东的深厚感情，为读者提供一系列多层次、多角度地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富有史料和学术价值的专著。我们殷切地希望广大读者和热心于研究毛泽东的同志给予支持和帮助。

《伟大人民领袖毛泽东丛书》编委会

2003 年 12 月

前 言

本书将有关评述毛泽东与中国当代杰出革命家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贺龙、陈毅、罗荣桓等人之间的工作关系、革命友谊、相互交往、思想交流、诗词唱和的文章结集出版,从一个新的视角给读者提供了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观点和资料。通过这些文章,读者可以从比较中具体而细微地了解毛泽东在政治风云、军事斗争、外交舞台等各个领域内的非凡智慧、卓越见解、运筹帷幄、化险为夷、议论纵横、笔走惊雷的人格魅力,也可以更亲切地感受到毛泽东充满喜怒哀乐丰富情感和人民领袖的精神风貌,更可以深刻地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紧密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休戚与共、血乳交融、密切配合、取长补短、集思广益、凝聚智慧,发挥出集体领导的伟大力量。

本书内容是编者根据作家、学者已经发表过的文章综合编辑而成的,这里要向这些文章的作者致以深深的谢意。需要说明的是,编者在综合这些文章时保留了原作者的观点。因此,本书中各篇文章的观点并不完全代表编者的观点。

毛泽东生前曾与许多亲密战友在无数次血与火、胜利与失

败、曲折与辉煌的严峻斗争中,并肩战斗、共克强敌、征服艰险,经历了一个个波澜起伏、曲折动人、意蕴深厚的故事。由于时间仓促,本书所收的文章只是毛泽东与一部分杰出革命家亲密合作和革命友谊的记录,远远没有达到全面、充分的要求。我们将继续努力搜集材料、加深研究,编出《毛泽东与中国当代杰出革命家》的续集。

限于时间和水平,本书的内容和形式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与专家批评指正。

翁 扬
2003年12月20日

目 录

总 序.....	(1)
前 言.....	(1)
毛泽东与周恩来.....	(1)
毛泽东与刘少奇	(13)
毛泽东与朱德	(23)
毛泽东与任弼时	(48)
毛泽东与邓小平	(70)
毛泽东与陈云	(81)
毛泽东与叶剑英	(90)
毛泽东与罗荣桓.....	(104)
毛泽东与刘伯承.....	(115)
毛泽东与彭德怀.....	(128)
毛泽东与陈毅.....	(143)
毛泽东与贺龙.....	(161)
毛泽东与徐向前.....	(172)
毛泽东与罗瑞卿.....	(181)

毛泽东与王稼祥	(194)
毛泽东与徐特立	(201)
毛泽东与宋任穷	(207)
毛泽东与许世友	(220)
毛泽东与宋庆龄	(236)

毛泽东与周恩来

毛泽东最离不开的是周恩来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而周恩来更突出的是一个伟大的国务活动家。有人说，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谋事是毛，成事是周”。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个人，的确是不可分离的。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常常有两人并称的例子。比如太平天国的洪杨（洪秀全、杨秀清）、戊戌维新运动的康梁（康有为、梁启超）、辛亥革命时期的孙黄（孙中山、黄兴），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的“南陈北李”等。两个人中总是以一个为主，另一个也有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往往是相互补充和相互依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虽然没有“毛周”这样的说法，但两人关系的紧密是有目共睹的。在两人的关系中，当然毛泽东起着主导的作用。邓小平讲过一句很中肯的话：没有毛主席，也许我们

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对周恩来，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周恩来。当然从青年时代起，周恩来一直是很杰出的，但真正能使他在一个正确方向下充分施展才能的，还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领导。这是事实。他们之间的关系确实是相得益彰。

尼克松曾讲过这么一句话：毛泽东是拿主意决定大事的人，周恩来是负责执行的。这话不无道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和文章，给人的感觉，就是毛泽东重在统筹全局，提出大政方针，那真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而周恩来的讲话和文章更多的是细致周密，人情入理。所以一般说来，毛泽东确实是更多的在把握大的方向，拿大主意；而周恩来更多的是负责执行和落实。

“谋事是毛，成事是周”是一般概括性的比较形象的说法。在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也是有意识地使自己主要扮演执行者的角色。一位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多年的老同志曾谈起过一件事：建国初，有一次他问周总理：你为什么不做些理论方面的工作？周总理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可见，周恩来从国家和革命事业全局的利益出发，甘愿把自己放在“配角”的位置。而他内心确实钦佩毛

泽东，相信毛泽东考虑这些更大的问题要比自己高明。也是尼克松讲过这么一句话：周恩来总是小心翼翼地把聚光灯的焦点只对准毛泽东一个人。

梁漱溟曾讲过：周恩来是绝顶聪明的人。毛泽东召集会议，特别是建国以后，讲起话来经常是国内国外，海阔天空。讲完了，说：就这样吧。究竟怎样？别人未必明白，但周恩来全明白。余下的事就要靠周恩来去贯彻执行了。梁漱溟的话，虽是一家之辞，但起码说明，在重大决策过程中，毛泽东的主导地位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之后少不了周恩来这位总理。同时也说明，毛、周二人之间有着高度的默契。

毛泽东的思想博大精深，有时候不能止于从字面上去理解它。对毛泽东的思想脉络，周恩来十分了解，能够准确把握；同时，对周恩来办事的细致周密，毛泽东也很放心。

周恩来对中国政治所起的作用，在毛泽东晚年，还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晚年的毛泽东，一方面越来越少参与党和国家的日常具体工作，另一方面他同实际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了。胡乔木讲到过，有一次他劝主席多到工厂农村去看看。主席说：我怎么去啊？我一去，人都围了上来，是我看工厂，还是工厂看我？在毛泽东晚年这种同实际越来越隔膜的状况下，周恩来在一些方针政策的制定方面对毛泽东所起的补充作用似乎比以往更多一些。

毛泽东、周恩来的一致和不一致

毛泽东、周恩来在党的历史上有一致的时候，也有不一致的时候。他们两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目标是一致的，而且周恩来对毛泽东确实心悦诚服。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之间为什么能建立起这样亲密而默契的合作关系。当然，他们之间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也有差别以至分歧。但他们之间一直没有发生过正面的尖锐的冲突，这和其他不少领导人显然不同。对于苏区时期，人们议论较多的有三件事：一件是苏区中央局的书记问题，一件是打赣州，一件是宁都会议。国外有人讲毛泽东、周恩来的矛盾是权力之争，说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就夺了毛泽东的权。这话不能成立。

在中央苏区，周恩来、毛泽东的关系稍微妙又稍曲折一些。从1927年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来看，周恩来对毛泽东似乎还不太理解，曾提出要撤毛泽东。1929年到红四军“七大”把毛泽东的前委书记选掉之后，周恩来又站出来支持毛泽东。要说他们有路线之争，恐怕不太好说，只是在个别的具体问题上，有时你这么看，有时我那么看。经过实践检验之后，错的，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对的，继续坚持。要知道，当时革命没有经验，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中央苏区以后，特别是抗战初期以后，他们之间就很少分歧，配合得很默契，创造出一个人间奇迹。

从总的看，毛泽东在政治上当然比周恩来要高，周恩来后来对毛泽东那样心悦诚服并不是偶然的。周恩来大体上还是在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制定的方针之下，也就是在这个大框架下，对事情考虑得很周密，有条有理地去做。他那精力充沛、机智果断地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是别人很少能做到的。而毛泽东比周恩来又要高出一大头：只要时局有个变动，毛泽东一下子就能提纲挈领地对形势做出全盘分析，提出一整套适应新形势的理论、方针、政策，造成一个新的格局。毛泽东的秘书林克说，毛泽东敢想别人不敢想的问题，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这是周恩来难以达到的。后来周对毛的心悦诚服是真诚的。至于对中央苏区时期，说党内的主要矛盾是毛泽东、周恩来的矛盾，这是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的说法。不过，建国后，遇到一些过去没有经历的新问题，毛周之间又产生了一些分歧。

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件事上：一是 1956 年前后的反“冒进”，一是“文化大革命”。在反冒进问题上，周恩来找毛泽东汇报时，两人争得很厉害。毛泽东提出要追加 20 个亿预算，周坚持不同意。据当时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他写检讨，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内心一定很复杂。但不能说他完全是违心的。在周恩来的检讨里，第一句话就是：“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这个话还是发自

内心的。当然是不是完全想通了，也未必。关于“文化大革命”，人们对周恩来议论较多，有的说他是忍辱负重，有的说他是“不倒翁”，是愚忠；更有甚者，个别人说他是软骨头。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一些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并没有告诉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在忙着华北抗旱，《海瑞罢官》的问题，他事先也不知道。后来成立工作组后不久，他又出国了很长时间。不过最初他对“文化大革命”恐怕是拥护的，实行反修防修，发动群众来消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阴暗面，这些在当时他不会反对。只是在方法上，什么人都打倒，他不会赞成。还有，他当时讲得很多的就是抓生产，生怕在这上面出事。其实，许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被专政，最初也还以为“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是对的，后来才慢慢觉得有问题了。现在在人们心里有个结：毛泽东很信任周恩来，也只有周恩来才能和毛泽东说上话；可周明明知道毛有很多做法是错误的，又为什么不向毛提意见呢？这涉及人们如何理解周恩来的问题。

1965年，周恩来在审查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讲了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即使是党的领袖犯了错误，只要没有发展到路线错误，提意见时，也要考虑到方式，考虑到效果，要注意党的团结。这时还没有搞“文化大革命”，也没有人想到会有后来那样的事；不过，这段话倒反映了周恩来处事方法的特

点。从当时的情况看，要周恩来在会上当场起来反对毛泽东提出的重要意见，他是不会那样做的，那样做也没有效。一般说来，他有不同意见时更可能的是在会下找毛泽东单独交换意见。如果给毛泽东讲了意见，毛泽东接受了，那么，周恩来下来贯彻时，只会讲主席说了什么，决不会说这个意见是他提的。反过来讲，周恩来提了意见、毛泽东没有接受，他下来还得贯彻毛泽东的意见，但他决不会说：我是不赞成的，我已提过了，主席不赞成我有什么办法。现在也没有证据说，周恩来向毛泽东提了多少不同意见；反过来也没有证据说，周恩来就没有向毛泽东提过不同意见。谁也没有根据，因为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历史上总有些后人再也无法弄清的事情。

关于说周恩来是不是软骨头的问题，现在有些年轻同志恐怕是不大理解、也不大懂得一个对国家、民族负有那么大责任的革命家、政治家，面对异常复杂的环境时，是怎样权衡利弊、考虑和处理问题的。当时的环境多么复杂，存在着许许多多制约因素，对负有这样大责任的周恩来来说，并不是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中，可以供周恩来选择的余地其实很小。某种程度上说，只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不赞成这样做，结果是什么呢？那只能是同毛泽东决裂，然后被打倒。另一种就是周恩来实际上所做

的，要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有时得违心地说一些话和做一些事，而在工作中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并为以后纠正错误准备种种条件。如果周恩来采取第一种选择，决裂和打倒，在当时于事无补；而且我们国家当时处在那样困难和混乱的情况中。林彪也好，“四人帮”也好，只是到处鼓动冲杀破坏。国家经济生活的维持、外交的联系、一些极端混乱状况的排除，甚至哪里没有煤了要用煤，哪里交通断了要疏通，全得要他在那里硬撑着。他身边的得力助手几乎都被打倒或靠边了。如果他下来，国家这些事怎么办？对“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事（包括保护老干部和民主人士、制止过分的混乱状态等），当时也只有周恩来说话还能起点作用。对党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怀有那样强烈责任感的周恩来，不可能不顾一切地任意采取行动。如果从个人来讲，他这样坚持着图的是什​​么？他没有野心当主席，这谁都承认。他没有什么财产，也没有子女。到晚年的政治处境并不是那么好过。1972年以后又病得那么严重。可是他仍然一天坚持十几个小时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文化大革命’里，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他在前面两种选择中作出后一种选择，对他自己也许是一种最痛苦的选择，但只能选择这条路；忍辱负重，力挽狂澜，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尽